

十九世纪末  
二十世纪初叶  
山西财政  
与经济

武静清 陈兴国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  
山西财政与经济

武静清 陈兴国 著



中财 B0034093

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  
总号 426376  
日期 7/27.25/6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8 号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  
山西财政与经济

武静清 陈兴国 著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城大佛寺东街 8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 6.5 印张 13 000 字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5330 定价：4.00 元

ISBN 7-5005-2074-3 / F · 1962

(图书出现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b>第一章 清朝末期的山西财政(1895—1911年) .....</b>	(1)
第一节 甲午战争后山西经济半封建半殖民地 化的加深 .....	(1)
第二节 财政机构和财政体制的变化 .....	(48)
第三节 山西财政收支概况 .....	(72)
<b>第二章 北洋政府时期的山西财政(1912—1926年) …</b>	(101)
第一节 辛亥革命后的山西经济 .....	(101)
第二节 山西地方财政机制变化及财政规模 .....	(130)
第三节 阎锡山财政思想和财政政策 .....	(155)
第四节 阎锡山增加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 .....	(162)
<b>第三章 国民政府时期的山西财政(1927—1936年) …</b>	(166)
第一节 国民政府时期的山西经济形势 .....	(166)
第二节 中原大战前后的山西财政形势 .....	(176)
第三节 阎锡山政权的财政收支状况 .....	(185)
第四节 阎锡山私人资本的扩大 .....	(196)

# 第一章 清朝末期的山西财政

(1895—1911年)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及《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的国家主权、社会经济和国际地位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清政府对日本国的巨额赔款不仅大大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而且把清王朝的统治推到了末期。于此同时，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先后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对外经济侵略活动更多地采用资本输出的形式。他们纷纷利用甲午战后中国因为巨额赔款而造成的财政困难和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中的有关条款，争着向中国输出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不但严重地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而且使帝国主义逐步地控制了中国的整个经济命脉，中国的社会经济更加半殖民地化了。

## 第一节 甲午战争后山西经济半封建 半殖民地化的加深

甲午战争后，山西这个“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的封闭型的自然经济省份，由于矿产资源丰富和素有“文献之邦”

美称，也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相吞食的肥肉。甲午战争后，英、美、法、德、俄、比等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鸦片输出，洋货倾销、原料搜刮，攫取矿路权、设立银行分支机构和输出资本等手段，大规模地加紧对山西经济的掠夺，形成了“一国干预，诸国从之”<sup>①</sup> 的侵略局面。

## 一、帝国主义加紧对山西的经济侵略

### (一) 鸦片、洋货大量倾销山西城乡

自 1800 年鸦片开始大量输入中国起，虽然也出现过较大规模的禁烟运动，但屡禁屡输的问题却亦然存在。鸦片走私活动不仅遍及中国沿海一带，而且也严重地祸及中国内地和边远山区。山西虽地处山陬，但由于明清时期山西人经商甚盛，富商巨贾甚多，其分庄铺号，分布于全国各地，有的还远涉重洋，在国外设立了经营网点，而且还有经营国际间贸易的“船帮”和“驼帮”。因此，在 1817 年山西就有商贩以内地土产换取洋烟、洋货而进行贩卖的记载。咸丰时的《太谷县志》载，嘉庆二十二年，太谷知县陈履和，对鸦片入晋，隐忧耿耿，出资立碑，警誉乡民，严禁贩运、吸食鸦片。碑载：

“自今以往，凡吾县中商民，往闽、广、苏、杭置货之人，誓不兴鸦片烟一丝一毫入我太谷，害我百姓。倘能格遵誓戒，神必富之；倘复私行贩卖，官必罪之；尚官法有所未及，神必助之；倘官吏昏贪纵容，神必与叛

---

<sup>①</sup> 《筹办夷务始末》，清同治朝，第 40 卷，第 24—26 页。

卖、买食之人同罚而共祸之。呜呼！人不可害，神不可欺。吾县民游闽、广、苏、杭者，在水愿无风波，在陆愿无险阻，此身平安，何利不可图？而必为此犯国法于神怒之事乎！若谓神道设教，渺茫无凭，商犯法而不知，官枉法而不问，聪明正直之灵必不出此。众商敬听，共求昭格。”

又据《中国宣教会百年史》记述，1807年太原曾设立71处戒烟所。这说明嘉庆年间山西就已经成为鸦片流毒的重灾区之一。

至道光十九年，当时山西巡抚申启贤在奏折中谈到山西省禁烟情况，写到：“山西省陆续拿获兴贩吸食鸦片，……统共前后拿获首缴烟土烟膏共三万八千三十一两二钱，烟具一万五千八百六十八件……”云云。这又说明，道光年间，贩烟者更盛嘉庆期。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山西经过数次查禁鸦片运动，一时成效显著。在民间，民众自发地组织起各类禁烟团体，对扑灭烟害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由于鸦片战后，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英美等国鸦片商贩，愈加疯狂地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特别是五口通商后，清政府的“寓禁于征”政策使鸦片输入合法化，加上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和对中国经济的控制，使鸦片商品输入在山西呈“愈发不可收拾”的局面。据《晋政辑要》载，到光绪年间，仅山西30厅、州、县举报，烟料坐商就达272户，捐银6500余两。当时山西共108个厅、州、县，如果全部统计，估计捐银在2万两左右。鸦片输入，流毒山西，清廷“寓禁于种”的政策，又使山西从光绪年间盛行种罂粟。

光绪二十三年，“山西罂粟之产，以太原、榆次、交城、文水、代州、归化（即今呼市，属内蒙）为盛，岁征土药地亩税银十万九千四百余，计通省全年所入银二十六万三千一百余两。太原一百七十六村，共种土药四千五百三十五亩七分。榆次一百五十村，共种土药三千零十三亩三分。交城一百四十五村，共种土药二千五百七十三亩八分。文水一百七十五村，共种土药四千二百零二亩五分。”<sup>①</sup> 光绪二十九年，“户部报告，山西征收土药税总额二十三万三千四百九十六两，”<sup>②</sup> 到宣统时，山西已“为著名之鸦片产地。”<sup>③</sup> 1910年，山西巡抚丁宝铨记述：“查晋省烟害，在于自种自吸，无地不种驯至无人不吸，祸及妇孺，实为各省之所无。”<sup>④</sup>

“洋药”、“土药”并行不悖，“土”“洋”结合，倍害于国于民。在烟害暴虐下，家庭破产的越来越多。据光绪时人许珏记述：

“戊戌（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闰三月，余自都中携眷来晋，……雇一奴，年已五十多，询之本农家，向未服役于人，……曰：“不得已也，吾家本有田数十亩，初年种杂粮米麦，颇足自给，后见种罂粟利厚，改种罂粟，岁入之数计其半已过往岁所获。由于吾夫日吸烟，继而吾子亦吸之，吾媳亦吸之，则岁之所入，除仅供吸烟外，而饔飧不足以自给矣。遂鬻其田之半，则并吸烟亦不足，去岁因尽鬻其

---

① 《晋省鸦片》，见清《农学报》第48期，光绪二十四年九月下。

② 清史资料《东方杂志》，卷47，第32页。

③ 茶圃：《各省禁烟成绩调查记》，清史资料，存山西师大图书馆。

④ 《清宣统政纪》卷47，第32页。

田。”<sup>①</sup>

鸦片流毒，罄竹难书，尤如洪水猛兽，受害者不计其数。然而外国鸦片贩子却大得巨额利润，而且也使他们的政府在财政上获得无法计算的收益。以当时英国在其殖民地印度实行专卖为例，远在 1774 年，印度殖民地政府的鸦片专卖收入就达到 27 万卢比，到 1829 年上升到 2000 万卢比，55 年间，增加了 73 倍。鸦片专卖收入在其政府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比例，绝大多数年份都在 5% 以上。而制造鸦片者的利润，却达到制造成本的 200—500%，<sup>②</sup> 英国对华的鸦片“贸易”，使英国垂手可得几亿元的利润。对于美国，“鸦片贸易就像奴隶和酿酒厂一样成为许多美国大资产的基础。”<sup>③</sup>

对帝国主义国家来说，这种“最安全、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给中国造成严重祸害，激起了中国朝野上下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山西人民禁止鸦片的呼声日高。山西之禁烟代表人物李素、李华炳二人，秉本省民众意愿，上书清廷政府，敦促禁烟，“恳速办废烟约及颁布废烟的公文以慰民望”<sup>④</sup>。在山西人民抵制鸦片的斗争和国内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清政府遂于宣统三年（1912 年）七月四日致函英使朱尔典，在英使许可下，拟定同年七月十九日起，禁止印度鸦片运入山西。就这样，在清封建王朝灭亡在即之时，祸及山

---

① 清许珏：《复庵遗集》卷 15，第 15—16 页。

② 严中平：《英国鸦片贩子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27 页。

③ 清史资料：Dennette: 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 第 119 页。

④ 《清外务部档》，4842 号，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西百年之久的鸦片，才得到初步的禁止。

同鸦片一起输入山西的，还有洋货。从 1840 年前，外国商品仅从广州一地入口起，山西就有“开张铺面，售卖广货”（广货为从广州口岸进口的洋货的统称）的记载。<sup>1</sup>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第一批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外国侵略者在那里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政府的行政管辖和法律的限制，为所欲为。随着外国势力的侵入，外国资本集团在中国倾销的商品日益增长。洋货输入的激增，造成中国的对外贸易不能维持平衡，白银大量外流。据严中平等编的《中国经济史统计资料选编》统计，1893 年至 1910 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差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年 代	进 口(元)	出 口(元)	进大于出差额 (元)
1893	235 823 000	181 713 000	54 110 000
1903	509 059 000	333 961 000	175 098 000
1910	721 299 000	593 337 000	127 962 000

至此，山西洋货倾销局势也同全国一样，日愈增长而又日渐繁多。山西购买洋货的来源也从一开始仅广州、天津等地进而扩大到广州、天津、上海、青岛、汉口、苏州、宁波、杭州、厦门、福州等口岸。

洋货倾销山西城乡的特点如下所述。

一是来势汹涌且时间长。从清王朝建立到鸦片战争爆发前的 200 年间，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基本形势是：政治上，一方面，清王朝由强盛走向衰落；另一方面，以英国为首的新兴的殖民主义者取代了老一代的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而侵略扩张成性的沙俄又崛起于中国的北疆。入侵的一方是以贸易为先导向中国进行扩展，而被入侵的一方，则以消极的限制乃至禁闭贸易作为防范外国侵略的武器。在经济上，一方面，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还十分牢固；另一方面，西方国家的现代产业还在发展成长之中，经济力量还不足以打开自给自足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市场。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虽然有扩大的趋势，但它的增加，只能维持一个比较小的速度和规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国家通过武力以不平等条约在中国取得了贸易的支配权，并以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相结合，逐渐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外汇和投资权。中西贸易的性质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毫无疑问，西方侵略者谋求对中国贸易的控制和掠夺，在 19 世纪中后期以前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酝酿、准备和逐步推进的过程。这就是说，中国沿海省份和城市遭受西方侵略也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以进入广州的西方国家贸易船只吨位为例，详见表 1-2。

与中国沿海省份和沿海城市相比，虽然山西商人贩运洋货入晋的时间也较早，但洋货倾晋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这一史实可以从北方码头天津港洋货输入情况得到反映：

“1861年，进入天津港的船只222只，总吨位数54322吨。”<sup>①</sup>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进入天津港商船已达到1052只，输入洋货971964吨”，是1861年的18倍之多。1884年的“英文贸易报告”记载，因山西洋货市场的扩大，以及“该年起到天津来的山西商人，又有了较大增多”原因，“刺激了需要”即增加了进口。<sup>②</sup>

甲午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列强对占有殖民地的要求更加迫切，分割世界的斗争空前加剧，中国进一步陷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洋货倾销在山西风行城乡，来势汹汹。详见表1-3。

从1905—1911年七年中，有稽可查之输晋洋货以海关价计算达银35051728海关两。此外还有偷漏税部分；海关以多计少的舞弊部分；本省商人贩运部分；且尚未包括鸦片输入部分。据计，七年中被洋行攫去的白银最低也在5000万两至6000万两之间。所以，郑裕孚在《上布政使丁陈管见》中说：“晋俗素称俭朴，然十室之邑，八口之家，无一人之身无洋货者，民安得不贫？”<sup>③</sup>

二是洋货倾销品种繁多，而且随着洋货输入量的迅速增长而增加。西方国家向中国倾销洋货，传统产品是棉花、棉纺织品、毛纺织品和部分工业品。详见表1-4中1871—1894年主要进口货物统计。

① 英文《商务报告》，清史资料1866—1868，天津。

② 佟飞：《天津开埠初期的洋行和买办》，天津日报，1964年4月22日。

③ 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92页。

表 1-2

## 进入广州的西方国家船只吨位

(1719—1833)

年 别	英 国			美 国			荷 兰			法 国			丹 麦			瑞 典			其 它			合 计	
	船 只	吨 位	船 只	吨 位	船 只	吨 位	船 只	吨 位	船 只	吨 位	船 只	吨 位	船 只	吨 位	船 只	吨 位	船 只	吨 位	船 只	吨 位	船 只	吨 位	
1719	2	650	—	—	—	—	—	—	—	—	—	—	—	—	—	—	4	1344	6	1994			
1730	4	1495	—	—	1	400	2	1300	—	—	—	—	—	—	—	—	1	400	8	3595			
1751	10	4700	—	—	4	3150	2	1800	1	950	2	1590	—	—	—	—	—	—	19	12190			
1790	46	29192	6	1970	3	2090	2	950	1	1100	—	—	—	—	—	—	1	300	59	35602			
1830	72	54940	25	10000	5	4000	5	3000	1	800	—	—	—	—	—	—	1	600	109	73340			
1833	107	64493	59	24000	8	3200	7	2800	4	1600	—	—	—	—	—	—	4	1600	189	97693			

资料来源：汪敬虞著：《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经济的侵略》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表 1-3 1901—1911 年洋货倾销山西市场

单位:张·海关两

年 度	输入海关	入晋子口税单 (张)	货价值银 (海关两)	合 计 (海关两)
1901	津海关		2511453	2511453
1905	津海关	3662	5664950	5664950
1906	津海关	4443	6578933	6581050
	江汉海关	5	2117	
1907	津海关	4443	4764462	4800818
	江汉海关	281	36356	
1908	津海关	3493	3707287	3786484
	江汉海关	843	79197	
1909	津海关	4054	3758800	3758800
1910	津海关	5199	5431976	5543773
	江汉海关	1859	111797	
1911	津海关	5106	4846719	4905853
	江汉海关	1355	59134	

资料来源:《山西外贸志》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4年,第126—127页。

甲午战后,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山西市场来看,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的主要进口商品本身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是主要进口商品以外的“进口杂货”发生了变化。两种变化的一个总的特点是,工业制品品种的增加。

在传统的主要进口商品中，初期棉花、棉布进口数量相当，逐渐棉纺织品的进口量增多。据载，19世纪80年代后期，大宗的英国粗斜纹布“深入内地，运往象山西这一类的市场。”<sup>①</sup>

至于新增的“进口杂货”，则近乎全是工业制品。它们单位价值不大，但是品种繁多，到清末，已经达到惊人的程度。正如郑观应在其《盛世危言》中说的：“如洋药、水药、丸药、粉药、洋烟丝、吕宋烟、夏湾拿烟、俄美纸卷烟、鼻烟、洋酒、火腿、洋肉铺、洋饼饵、洋糖、洋盐、洋果干、洋水果、咖啡，其零星莫可指名者尤夥。”“洋布之外，又有洋绸、洋缎、洋呢、洋羽毛、洋漳绒、洋羽纱、洋被、洋毯、洋毡、洋手巾、洋花边、洋钮扣、洋针、洋线、洋伞、洋灯、洋纸、洋钉、洋画、洋笔、洋墨水、洋颜料、洋皮箱箧、洋磁、洋牙刷、洋牙粉、洋胰、洋火、洋油，其零星莫可指名者亦夥。”“外此更有电气灯、自来水、照相玻璃、大小镜片、铅、铜、铁、锡、煤斤、马口铁、洋木器、洋钟表、日规、寒暑表，一切玩好奇淫之具，种类殊繁，指不胜屈，……以上各种类，皆畅行各口，销入内地。人置家备，弃旧翻新，耗我赀财，何可悉数！”<sup>②</sup>这就是说，甲午战后，杂货进口，已经取得了同鸦片、棉纺织品鼎立的地位，使“饮食日用日洋货者，殆不啻十之五矣。”<sup>③</sup>

① 英文《贸易报告》，清史资料1889年，天津，第45页。

② 郑观应：《盛世危言》清1893年版，卷3，第17—18页。

③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46—647页。

表 1-4

1871—1894 年主要进口货物统计

年度	鸦片 (公担)	棉布 (元)	棉纱 (公担)	棉花 (公担)	染料等 (元)	煤油 (公升)	糖 (公担)	米 (公担)	钢及铁 (公担)
1871—1873	37408	32013727	37791	151491	939550	—	125578	415993	142806
1881—1883	42777	28493537	118020	106373	727688	176513915	43683	137940	273717
1891—1893	43558	44911705	704877	54567	2958720	—	477975	3650399	887337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46页提供数据整理。

三是洋货倾晋，价格很高，英、美货销路相差较大。入晋洋货价格同沿海地位比较，一般平均高出五倍左右。以1873—1890年，沿海进口货价格指数为例，沿海1873年进口货物价指数为100，到1890年，棉纱的价格为33.91，本色市布为61.45，洋标布为75.61，粗细斜纹布为60.00，火柴为35.80<sup>①</sup>，山西市场上1890—1894年，上述几种商品的价格都比沿海高57%左右。

在输晋外国商品中，美国商品较英国商品销路迟缓。英国对中国棉织品市场的开辟，起始于17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经历了大半个世纪后，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英国在华棉布销价达到170万英镑。而美国棉布之推销于中国，是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到了50年代，成为美国输华的最主要商品，曾大量倾销于中国南京市。60年代以后，美布来华，出现了停滞局面，一直到甲午战后（1897年），美国整个对中国的进口贸易，没有超过中国进口全部的3%，一直处于徘徊不前的状况。由于战争，向北方内地推销的“美国棉布销得奇慢”，“中国掮客购买美国棉货一天天减少。”<sup>②</sup> 美国棉布即使在美国对华输出中占很大比例，但在中国进口中所占的比重，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

总之，各帝国主义国家对山西倾销鸦片、洋货，使山西这个内陆省份的经济也被拉上为外国帝国资本服务的买办化的道路。

---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料》，第3册，中国书局1962年版，第1646—1647页。

②. 清史资料：Lockwood: Augustine Heard and Company. 1971年版，第48页，存山西社科院图书资料中心。